



都市乡民的终结

——新市民城市性积累与市民化

王兴周/著



科学出版社

都市乡民的终结

——新市民城市性积累与市民化

王兴周/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提出了全面的人的城市化思路,为城市性理论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新案例。

本书在系统梳理“人的城市化”“农民的终结”“新市民”“城市性”“现代性”“城市性不足”“都市乡民”“内卷化”等概念和相关理论基础上,对中国都市乡民问题的现状、性质、风险都进行了探讨;同时以农民工为例对新市民社会交往内卷化问题进行了验证。本书就新市民如何融入城市、都市乡民问题如何解决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本书可供关注城市化、城市性、市民化问题的学者和城市规划领域的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乡民的终结:新市民城市性积累与市民化/王兴周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03-049271-5

I. ①都… II. ①王… III. ①民工—城市化—研究—中国 IV. ①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6497 号

责任编辑:郭勇斌 蔡 芹 / 责任校对:杜子昂

责任印制:张 伟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数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3

字数:260 000

定价: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背景、内容和方法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主要内容简介	1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过程	4
一、研究方法	4
二、调查对象	4
三、定性研究	5
四、抽样方法	6
五、调查实施及质量控制	8
六、样本规模及结构	8
第二章 中国城市化的机遇与挑战	10
第一节 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期	10
第二节 乡土社会解体后农民如何终结	12
第三节 新型城市化如何以人为中心	15
第四节 中国城市化的结构性矛盾	19
第五节 从农民、农民工到新市民	23
第三章 都市乡民：新市民城市融入的必经阶段	34
第一节 “城市性”概念界定	34
第二节 都市乡民概念及其由来	38
第三节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都市乡民群体	43
一、失地农民与城中村	43
二、流动人口聚居区	49
三、建筑业农民工	53
四、“宿舍劳动体制”农民工	54
第四节 都市乡民群体的性质和命运	56
一、“毒瘤”论	56
二、功能论	57
三、控制论	58
四、三元社会结构理论	60
第五节 都市乡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性社会群体	64

第四章 中国新市民的“乡民性”特征	68
第一节 隔离性、乡村性的居住生活模式	69
第二节 内向性、初级性的社会交往模式	73
第三节 矛盾性、模糊性的社会身份认同	83
第四节 封闭性、选择性的城市社会融入	87
第五节 持续性、频繁性的乡村社会联系	92
第五章 内卷化：新市民城市化停滞的陷阱	96
第一节 内卷化理论及其由来	96
第二节 “内卷化”概念及其测量	103
第三节 “农民工社会交往内卷化”检验方案	106
第四节 “农民工社会交往内卷化”检验结果	110
一、农民工社会交往发展曲线	110
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112
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112
第五节 刚性约束：都市乡民生活方式	114
一、农民工社会交往内卷化曲线具有“伸平”特征	114
二、农民工社会交往模式的“刚性约束”是都市乡民生活方式	115
三、全面性人的城市化是农民工社会交往“去内卷化”的根本出路	117
第六章 城市性积累：都市乡民终结之路	118
第一节 城市性积累的影响因素假设	118
第二节 “城市性”测量指标体系	119
第三节 新市民“城市性”描述性统计结果	122
第四节 新市民“城市性”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123
一、新市民居住生活模式影响因素	124
二、新市民社会交往模式影响因素	126
三、新市民社会身份认同影响因素	130
四、新市民城市社会融入影响因素	134
五、新市民乡村社会联系影响因素	140
第五节 新市民城市性积累动力机制	144
一、城市规模对新市民城市性积累的影响	144
二、人力资本对新市民城市性积累的影响	145
三、收入对新市民城市性积累的影响	146
四、民族对新市民城市性积累的影响	146
五、进城时间对新市民城市性积累的影响	147

六、居留城市数量对新市民城市性积累的影响·····	148
七、职业对新市民城市性积累的影响·····	148
第七章 新市民城市融入及相关政府职能 ·····	151
第一节 新市民城市融入路径·····	151
第二节 新市民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政府缺位问题·····	154
一、政府在新市民社会支持方面作用非常有限·····	154
二、多数新市民反映政府失职·····	155
三、新市民对政府部门人员评价不高·····	155
四、新市民有不愉快的经历·····	156
第三节 新市民对政府的期望及相关政策思考·····	157
一、信息咨询服务·····	157
二、消除歧视,提高地位·····	158
三、新市民教育·····	159
四、成立专门机构·····	162
五、组织社区活动·····	164
第八章 结语 ·····	166
第一节 本书主要研究结论·····	166
一、都市乡民已经成为一个显性化的社会问题·····	166
二、抽样调查数据证实了中国都市乡民问题的客观存在·····	166
三、“农民工社会交往内卷化”命题得到证实·····	166
四、从城市性影响因素可以寻找到新市民融入城市社会的动力·····	167
五、城市政府应该承担新市民管理和服务的职责·····	167
第二节 未来研究方向·····	168
一、新市民城市性发展水平的测量有明显欠缺·····	168
二、都市乡民的生成机制尚未完全厘清·····	169
三、基于“都市乡民终结”的市民化制度设计有待进一步研究·····	170
参考文献 ·····	172
附录:调查问卷 ·····	186
后记 ·····	197

第一章 导论：背景、内容和方法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991年年末，中国城镇人口 31 203 万人，城市化率为 26.94%；2013 年年底，中国城镇人口达到 73 111 万人，城市化率 53.73%。22 年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了 1.34 倍，城市化率翻了一番多。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 号）的正式公布，困扰学界和政府部门多年的户籍难题已经有解，“半城市化”“伪城市化”“虚城市化”“假城市化”问题逐渐进入融冰阶段。然而，中国城市化依然任重而道远，一个新的难题即都市乡民群体的逐步形成和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国新型城市化的障碍。因此，对都市乡民群体进行深度剖析，分析这一群体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剖析都市乡民问题的性质和特征，探讨解决都市乡民问题的方法，对于全面推行以人的城市化为目的的新型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本书重点探究了新市民褪去乡村性、积累城市性、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形成都市人格的发展规律，以及新市民城市性积累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即探寻新市民人格和生活方式城市化的路径。本书的目的是为促进中国农民真正走向彻底终结、实现全面的人的城市化、解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在数量规模高速增长的同时保证城市化的质量提供数据和策略支持。本书的研究对象不是农民工、流动人口，而是新市民，即在农村出生、长大，因各种主客观原因进入城市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在城市有较为稳定的职业或其他生活来源并有固定居住场所，有在城市长期生活的可能或倾向的人，包括失地农民、农民工、农村进城投资经商人员、来自农村的大中专学生、毕业后在城市工作的农村青年、进城居住的新市民的配偶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等。

第二节 主要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 6 个部分：中国城市化的机遇与挑战；都市乡民：新市民城市融入的必经阶段；中国新市民的“乡民性”特征；内卷化：新市民城市化停滞的陷阱；城市性积累：都市乡民终结之路；新市民城市融入及相关政府职能。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先将各部分内容简介如下。

第二章分析了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指出“十二五”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新的转折期,在城市化率高速增长的同时,人的城市化尤其是新市民的人格和生活方式城市化日益成为城市化的新主题。本章提出了“全面的人的城市化”理念,即“人的城市化”不仅包括“人口城市化(户籍市民化)”,而且包括“人格和生活方式城市化”,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本章重新界定了“农民的终结”的含义:“村落的终结”不等于“农民的终结”,农民进城也不等于“农民的终结”;“农民的终结”必须包括居住区域、职业、身份、人格和生活方式4个方面的完整意义上的“农民的终结”。本章还追溯了“新市民”概念的由来、历史,梳理了“新市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给出了“新市民”概念的新定义,指出在新形势下“农民工”概念已经过时,应该用“新市民”概念来指称进入城市工作生活的各种类型的原农村人。

第三章通过理论回顾和文献研究,分析了都市乡民概念的由来及中国都市乡民问题的现状,探讨了都市乡民的性质和命运,指出都市乡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性社会群体,是新市民人格和生活方式城市化并融入城市的必经阶段。在介绍“城市性”“现代性”“城市性滞后(不足)”等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率先将都市乡民概念及相关理论引入中国学术界,用以概括进城之初的新市民的人格和生活方式现状。在都市乡民的概念框架下,失地(农转非)农民、农民工、进城投资经商创业的农民、投亲靠友的乡城移民等原本孤立的研究对象有了有机的联系,成为一个完整的“新”的研究对象,“新市民”概念得到有力的支撑。本章从城市性理论研究出发总结世界各国人的城市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提出农民进城以后必然经历都市乡民阶段,新市民融入城市、变成合格市民的过程就是其逐步褪去乡民性的过程,所以“农民的终结”的必经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就是“都市乡民的终结”。

第四章运用在珠三角4个城市进行的关于新市民的定性、定量调查资料和数据,根据都市乡民理论建立分析框架,分析了我国新市民的“乡民性”特征,包括:隔离性和乡村性的居住生活模式、内向性和初级性的社会交往模式、矛盾性和模糊性的社会身份认同、封闭性和选择性的城市社会融入,以及持续性和频繁性的乡村社会联系5个方面。第三章通过文献研究勾画中国都市乡民现状,包括其规模、结构、群体特征,本章通过珠三角4个城市新市民问卷调查的资料描述新市民“乡民性”的具体表现和数量特征。

第五章系统梳理了内卷化理论,并设计了内卷化测量和检验方案,运用珠三角9个城市的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对学界近年来热烈讨论的“农民工社会交往内卷化”假设进行了检验,发现“农民工社会交往内卷化”问题确实存在,其刚性约束(内卷化原因)就是都市乡民生活方式,去内卷化的出路就是“都市乡民的终结”。本章对中国都市乡民问题进行了思考,分析其性质和成因,

并通过珠三角 9 个城市农民工问卷调查的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探讨都市乡民的形成机制。

第六章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性测量的指标体系，运用指标体系和珠三角 4 个城市抽样调查数据对新市民城市性水平进行了测量，并建立了 27 个回归模型，研究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市民城市性获得的动力机制和影响因素，发现城市规模、人力资本、收入、民族、进城时间、居留城市数量、职业对新市民城市性获得都有显著性影响，并据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在设计城市性测量的指标体系时，本章既吸收了西方城市性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成果，同时又注意规避其抽象、空洞、脱离现实的缺陷，注重指标的中立性、现实性和可测量性，特别注意对中国实际情况的针对性。在建立模型时，不仅吸取了西方城市性理论和经验研究反复论证过的“一般性”假设（城市规模、人口特征），而且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农民流动实际的“特殊性”假设（进城时间、流动经历）。通过珠三角 4 个城市新市民问卷调查的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探讨新市民城市性积累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从而探寻都市乡民终结、新市民人格和生活方式城市化的路径。

第七章探讨了新市民人格和生活方式城市化并融入城市的路径，包括走出封闭的都市乡村物理环境、进入持续向上流动的生计通道、逐步拓展次生异质性社会关系网络、学习都市文化并逐步养成市民人格 4 个方面；同时根据新市民调查结果分析了新市民人格和生活方式城市化方面政府职能缺位的现状，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包括信息咨询服务、消除歧视、新市民教育、成立专门机构、组织社区活动等。本章还分析了新市民城市融入的路径，并对照该路径分析新市民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政府缺位问题，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

本书对“人的城市化”“农民的终结”“新市民”“城市性”“现代性”“城市性不足”“都市乡民”“内卷化”等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性探讨，为城市化、城市性研究领域积累了新的知识。本书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以快速城市化的当代中国社会为案例展开，为城市性理论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新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性理论的创新，为城市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书提出了“全面的人的城市化”思路，指出了在城市化率高速增长并日益接近“70%”的目标值、户籍问题也逐步进入融冰阶段的今天，城市化的新问题、新目标、新任务将是新市民的人格和生活方式城市化。这为学界和政府明确城市化研究的方向、制定城市化规划的思路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本书对中国都市乡民问题的现状、性质、风险都进行了探讨，同时以农民工为例对新市民社会交往内卷化问题进行了验证，这对全社会认清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社会风险具有一定警醒作用。本书就新市民如何融入城市、都市乡民问题如何解决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可以为政府解决相关问题提供决策依据。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过程

一、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mixed method)。焦点小组座谈会(Focus Group Discussion)在市场研究行业运用非常广泛,但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应用不多,本书运用了这种方法,对于深入挖掘新市民的深层心理和动机作用非常明显。流动人口调查的抽样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难题。流动人口调查的抽样框很难获得,且流动人口成分复杂、类型多样,很难用同一个抽样框进行抽样。本书在这方面有了新的突破:用地图分割法形成抽样框,规定样本区域的问卷数量,并限制调查员的访问数量,这样就用区域的代表性保证了整个样本的代表性。自填问卷法和访问法一直被当作两种独立的数据收集方法使用。本书将这两种方法结合使用,用访问法进行甄别访问,用访问员指导、监督下被访者自填法进行主问卷调查。这样既保证了调查对象选择的严谨性,避免不合格调查对象进入样本,又使调查过程人性化,避免被访者厌烦。

二、调查对象

本书的调查对象界定为:来自农村地区,在农村长大,在城市连续工作或生活半年以上(不一定在同一个城市工作或生活过;必须连续半年及以上且不能中断;目前在城市工作或生活)的原农村人。这一界定基本上和国家统计局部门测算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一致,因而本书的调查对象能够代表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的城镇常住居民。本书的调查对象全面涵盖城郊征地拆迁的失地农民、居住在城中村和流动人口聚居区的进城农民、工厂集体宿舍的农民工和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本书的调查是典型的新市民调查,而不仅仅是农民工调查、流动人口调查或失地农民调查。这些样本又可以分成6类:农民工(考虑到农民工有着不同的行业分类,故把农民工依照行业初步分为制造业、服务业、商业、建筑业、家政保姆、公共环卫和其他行业的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非农民工(如教师等);政府征地变成的新市民;读书进城的农村青年;进城投资(个体、私营)的农村人;随子女、配偶、亲属进城生活的农村人。需要指出的是,离土离乡的农民工及其亲属是本书调查对象的主体,且不包括城镇之间流动的非都市乡民人口。

三、定性研究

根据上述对调查对象类型的划分,在执行深度访谈过程中,考虑到职业差异、工作及居住地点差异,为了使访谈对象更加具有代表性,本书按照“去特色社区找不同类型的被访者”的原则,每一个类型的访谈对象都从本类型人群集聚的地方寻找。其中,把城市划分为工厂区、居民和商品房小区、安置小区、服务业店面、商场、大中专院校、建筑工地等区域,然后分别对应去这些区域寻找制造业工人、保姆/随子女配偶亲属进城的新市民/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非农民工、政府征地新市民、服务业员工、投资(个体、私营)进城的企业主、读书进城的学生、建筑工人等群体。除了制造业工人的访谈对象在东莞市和佛山市寻找之外,其他6类群体都在广州市范围内寻找。

通过分析深度访谈资料,本书认为新市民进入城市时间越久,其城市生活体验也越多,因此更能理解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区别和差距。为了更好地挖掘新市民在城市中的生活感受,故组织召开了两场座谈会。座谈会通过严格甄别筛选出符合要求的新市民来参与。两场座谈会,每一场有8位符合要求的新市民参加,但在执行过程中,考虑参加座谈会的人有可能临时不能出席,每一场座谈会都多预约了一倍以上数量的新市民,通过设定条件对他们一一进行现场甄别。对于那些没参与座谈会而又应约的新市民,分别对他们进行了短时间的访问。座谈会分为男性组和女性组,年龄20~44岁,包括了制造业、服务业、商业建筑业、公共环卫及其他行业的农民工,以及读书进城、投资(个体、私营)进城、婚姻进城等各类新市民。两场座谈会全程录音和录像,并有专门的文员进行现场记录。在座谈会之后,整理好座谈会笔录之后对座谈会进行总结分析。

在深入访谈和座谈会中,根据前期文献回顾中所关注到的新市民工作、生活及精神状况设计访问主题。内容包括:个人基本资料;生活经历;城市性的测量;主观感受;生活形态、环境与农村有什么不同;社会交往的变化;对他人的行为的看法;工作环境、感受;生活有无变化;居住环境;消费动机与意愿;社区关怀与帮助;出行的交通工具;外出就餐、家居装饰;对城市人的看法及城里人对他们的看法;遇到的困难、文化的差异、资源获取的差异;衣着的变化;语言的使用;生活习惯的变化;社会秩序意识;一天的作息時間,一日三餐;观念上的变化;生育观、消费观;对城市的看法和对农村的看法;社会参与度及其收获、感受;社会认同;与留在农村的同龄人比较;子女教育、教育方式、对子女期待;时间观念、生活态度、未来规划(老了以后)。

四、抽样方法

城市性的理论认为,城市的规模、经济发展程度、人口聚集程度、产业规模等宏观变量都会对新市民的城市性积累产生影响,而“地图法”抽样能够全面涵盖不同类型的区域。美国著名统计学家基什(Kish)就在他的著作中对地图法抽样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这本书1997年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莱斯利·基什,1997)。另外,由于住宅能够和一定区域内人口对应起来,并且具有不重不漏的特点,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就采用了绘制普查小区地图的方法进行摸底调查,关于绘图,关于分块,已有了大量的经验。自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采用地图法抽样以来,近几年国内的几个大型社会调查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末端抽样(方长春,2006;高和荣等,2011)。采用地图法抽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每一个抽样单元(城市社区)里的所有人口都有相同的机会被抽中。在实际调查中,只要是在调查期间出现在抽样点中的新市民都是符合要求的。因此,当采用地图法抽样进行定量问卷调查,该社区范围内(暂时性的社区范围人口)的所有人都有机会被抽中。抽样操作步骤如下:

(1) 获取样本城市或区县的平面地图并准确界定样本城市或区县的行政边界。

(2) 将样本城市或区县按规则分成若干个抽样片区,即将地图等分成若干个格子,抽样框的格子数量为样本小区数量的6倍。首先将地图切分成规定数量的等份;然后去掉明显不符合抽样规则的格子(如水面、野地等无人区域),对每个格子的边界进行调整(人口密集程度高的区域可以一分为二,以补充去掉格子的缺额);最后编号,形成抽样框。

(3) 按等距抽样原则隔5抽1,随机抽取样本小区;样本小区的数量是该样本城市或区县计划样本数的1/10。

(4) 在所抽取的样本小区中选取人流量较大的地方确定样本点;每一个样本小区选取1个样本点;对抽出的样本点在调查执行之前预先踩点,可以减少由于使用地图法抽样抽出的样本点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且得以在调查执行之前进行修正。譬如抽到一些公园或者工厂厂房区等没有人居的地方,就可以对地图的划分模型进行修正。

(5) 在样本点中进行街头拦截访问,为了尽可能保证样本的分散性,规定每一个样本点只能完成10份成功问卷。

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个城市。在这9个城市中,每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都不一样,且每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也有其独特性,每个城市的规模、经济发展程度、人口聚集程度、产业规模的不一致都有可能影响新市民的城市性积累。本书基于珠三角地区城市和人

口规模进行抽样，采用国家统计局 2010 年关于珠三角各个城市的人口规模的数据，按照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 4 种城市规模进行划分，广州、深圳为特大城市，佛山、东莞为大城市，中山、惠州、江门、珠海和肇庆为中等城市。考虑广州作为省府城市，其城市发展历史比深圳更加久远，故将广州作为特大城市的调查区域；而东莞与佛山相比，在新城市发展和新市民发展方面更具特色，因此把东莞作为大城市的调查区域；中等城市则选择江门作为调查区域，因为不仅其生产总值居中，人口密度和产业比值都相对适中，而且其城市发展也受到历史传统和现代城市化的影响。因此，抽取广州市、东莞市、江门市分别代表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为了考察城市规模对城市性的影响，在区分三类城市的基础上，在中等城市的下辖区县中选择了台山市作为小城市的调查样本区域。珠三角 9 个城市的人口状况^①见表 1.1。

表 1.1 珠三角 9 个城市人口状况

城市	总人口/万人	城镇人口比重/%	城镇人口数量/万人
广州	1 270.08	94.09	1 195.02
深圳	1 035.79	100	1 035.79
佛山	719.43	84.99	611.44
东莞	822.02	84.81	697.16
中山	312.09	86.00	268.40
江门	444.89	43.85	195.08
惠州	459.70	41.55	191.01
肇庆	391.81	40.67	159.35
珠海	156.02	90.32	140.92

本书按照不同区域的产业情况分别抽取了广州市海珠区、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番禺区分别代表不同类型的新市民。利用地图画格在以上区域最终确定 40 个样本点，并对 40 个样本点进行加权，使用“定点+类型”的方式抽取调查点，最终在每个样本点区域完成 10 份问卷。考虑东莞市的行政区域划分为区镇的形式，且其下辖镇比较多，因此，把东莞市各区镇的经济总量进行排名，按高中低三类经济发展水平抽取出 10 个区镇。被抽中的区镇分别有莞城区、厚街镇、虎门镇、石龙镇、寮步镇、大岭山镇、常平镇、樟木头镇、中堂镇、塘厦镇，然后在每个镇选择 4 个样本点区域，在每个样本点区域内完成 10 份问卷。江门市主要的新市民和大型企业都集中在蓬江区和江海区，因此在蓬江区和江海区两个市区范

^① 数据来自广东省统计局 2011 年 5 月 10 日通报。

围共抽取 30 个样本点区域，在每个样本点区域完成 10 份问卷。台山市则在台城区抽取 20 个样本点区域，同样在每个样本点区域完成 10 份问卷。

五、调查实施及质量控制

采用招聘当地高校大学生作为访问员的方式执行访问。通过面试的形式选用熟悉当地语言和情况的大学生作为访问员。在访问员进行访问之前，派出富有经验的督导进行培训，在培训过程中进行模拟访问，并派人监督每个访问员的模拟访问，一旦发现有问答不正确或者访问员使用带有意向性的语气进行访问时马上纠正。与培训及格的同学签署劳务合同，并让其承诺必须按照培训的流程进行访问，遵循一旦作假全部作废的原则。在执行过程中，分别在中山大学、东莞理工学院、广东医学院（东莞校区）、五邑大学等高校招募访问员，并派出研究生作为督导，每个督导各自带领 5 个访问员，在抽样区域进行街头调查。对接受访问的被访者赠予答谢礼物。

为了保证质量，本书先完成了广州的样本，在总结广州执行经验的基础上再对其他城市进行调查。执行调查时出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开具的课题调查证明，增加被访者的责任感和信任度。督导在调查区域内对访问的执行进行现场监控，对问卷进行一审，一旦发现甄别问题出错或者问卷填答错误，都要求访问员立即进行补救。在问卷回收当天晚上，每一份问卷都会由负责督导进行二审，二审主要看跳答和逻辑题目是否存在跳答错误和常识性错误等问题。调查时会请被访者留下电话号码，然后由独立的质量管理小组全部进行电话回访复核。在问卷录入之前，将会由不同督导对问卷进行交叉审核，是为三审，一旦出现问题均把问卷作废。

六、样本规模及结构

本书原计划定量调查总样本 1200 个，在广州市、东莞市、江门市、台山市分别完成 400 份、300 份、300 份、200 份。最后实际回收问卷 1236 份，剔除无法弥补的废卷之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1220 份。具体样本分布如表 1.2。

表 1.2 样本及其区域、类型分布

样本类型	样本区域分布				合计
	广州	东莞	江门	台山	
外出打工/个	262	236	164	120	782
投资做生意/个	109	41	95	54	299
国家单位工作/个	7	3	3	1	14
投亲靠友/个	5	8	5	1	19
无工作、未工作或无固定工作/个	22	18	30	36	106
合计/个	405	306	297	212	1 220

表 1.3 反映了本次抽样调查的样本结构。为了评估本样本的代表性，对照分析了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①中同样统计口径的数据结构，结果表明，样本数据结构与对照数据结构在婚姻、生计、技能培训等方面高度一致，说明本书的样本结构与全国农民工数据的结构基本吻合；另外本书的样本还客观反映了珠三角农民工女性比例高、年龄相对较小、文化程度较高等特点。

表 1.3 样本结构及其代表性评估

指标	样本数据	全国数据
性别/%	男性	66.4
	女性	33.6
	合计	100
年龄/%	16~20 岁	4.9
	21~30 岁	31.9
	31~40 岁	22.5
	41~50 岁	25.6
	50 岁以上	15.1
	合计	100
婚姻/%	已婚	73.4
	未婚	26.6
	合计	100
生计/%	自营	27.2
	受雇	72.8
	合计	100.0
技能培训/%	参加过	36.3
	未参加过	63.7
	合计	100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5.8
	初中	60.5
	高中、中专、技校	18.0
	大专及以上	5.7
	合计	100
月均收入/元	2 683.1	2 290.0

① 本书的调查执行时间是 2011 年末，考虑到数据在时间上的可比性，故选择了 2012 年的监测数据。“婚姻”一项 2012 年数据缺，因此采用 2011 年数据。

第二章 中国城市化的机遇与挑战

本章将在回顾中国城市化历程的基础上，分析目前城市化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由此聚焦出本书的研究主题。

第一节 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期

赵冈（2006）测算过中国各个朝代的总人口和城市人口，估算出了各个历史时点上的城市化率。根据他的估计，战国时期（约公元前 300 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15.9%，300 年后的西汉末年为 17.5%，到唐朝中期（745 年）略增至 20.8%，南宋（1200 年）城市化率达到中国古代的最高值 22.0%；以后各代城市化率较低，直到清朝中前期（1820 年）为 6.9%，晚清（1893 年）7.7%；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城市化率只有 10.6%，1957 年上升至 15.7%。虽然赵冈先生的测算结果仅为一家之言，而且他自己也先声明“本章所使用的历史资料，可靠性当然都不是很高，推估得出的结果自然会有相当大的误差”（赵冈，2006：59），但是仍然可以从中大致看出中国 2000 多年传统社会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及其变动轨迹。从这一组数据看来，受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制约，中国在 2000 多年传统社会里，城市化水平整体上很低；南宋以前，城市化率基本上稳定在 20%左右；南宋以后，受编户齐民、保甲制度等国家政策限制，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反而大幅度萎缩，城市化率下降 1 倍以上，一直稳定在 7%左右；晚清以后，随着近现代工商业的引入和初步发展，城市化率才有小幅增长。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农业社会中的城市只担负国家行政管理、军事防御、手工业和小商业聚集等几个原始功能，人口从农村往城市流动缺乏持久性动力，城市缺乏大规模聚集和承载人口的经济基础。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49 年，我国城市市区人口 3949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 7.3%。1957 年年末，我国城市市区人口增加到 7077.27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提高到 10.9%。三年“大跃进”后的 1962 年，我国城市市区人口由 7077.27 万人增加到 10 132.47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 15.4%。到 1965 年，我国城市市区人口下降到 8857.62 万人，比重由 15.4%下降到 12.2%。到 1978 年，城镇人口为 17 245 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缓慢提升至 17.92%。1979~1991 年，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全国新增加城市 286 个，1991 年末城镇人口达到 31 203 万人，城市化率升至 26.9%。1992~2008 年，城市化率稳定发展，2008 年年底，全国城市总数比 1991 年增加 176 个，城镇人口比 1991 年增加 90.3%，

城市化率提高到 45.7%。此后几年中国城市化率保持年均 1% 左右的增长水平, 城市化率 2009 年 46.6%, 2010 年 47.5%, 2011 年 51.27%, 2012 年 52.57%, 2013 年达到 53.73%。我国幅员广大, 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 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已经接近“70% 城市化率”这一城市化进程完成的标志。2010 年, 广东、浙江、辽宁三省城市化率就分别达到了 63.4%、61.0%、60.4% (杨宏翔, 2013)。

综合各方面信息, 可以估计, 在正常情况下未来 20 年内中国城市化率将以大致每年 1 个百分点的速度继续增长。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预测, 全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 约 1.2 亿~1.3 亿。在没有其他更好的转移渠道的情况下, 这些剩余劳动力还将会以农民工的形式转移出来。如果按全国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加 600 万~800 万人计算, 还需 20 多年的时间才能消化完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2006: 63)。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一项研究显示, 在未来 20 年内, 中国城市 40% 以上的人口将由移民组成, 当地政府向市民提供服务的能力将面临巨大压力。在现有 1.03 亿城市移民的基础上, 在 2025 年前, 中国城市还将面临另外 2.43 亿移民涌入, 导致城市总人口接近 10 亿人。在大中型城市中, 约有半数的人口都将是移民, 大约相当于现有水平的 3 倍。该研究报告作者认为 40%~50% 的城市人口都将是农民工 (何黎, 2008)。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城市化率从 1993 年的 28% 提高到 2005 年的 42.99%, 年均增长 1.25 个百分点,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继续增长, 到 2020 年, 我国的城市化率大概将达到 55%~60%。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十几年内, 还将有 3 亿~4 亿的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以江苏省为例, 1990 年江苏城市化水平超过 20%, 2005 年江苏城市化水平已达 50.5%, 城镇人口为 3774.62 万。也就是说江苏省每年新增城市人口 100 多万, 在城市人口中 1/3 以上是近 10 年进入城市的新市民 (朱悦怡, 2007)。

城市化是中国内卷化农业的根本出路, 可以促进中国农业步入现代化轨道; 城市化是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可以拉动内需, 为中国新一轮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引擎; 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相伴而生, 将促进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转型; 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是中国进入现代化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但是, 由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基础、历史背景和制度环境, 以及城市化发展的独特起点、路径和过程, 中国城市化在表面数据背后存在诸多结构性矛盾, 还有不少尚待解决的问题, 面临种种挑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 城市化率只反映了城市化的数量和规模水平, 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农民转移是否彻底及新市民的素质水平高低才能综合反映城市化的质量, 有数量没质量的城市化是不彻底、不成功的城市化, 必然潜藏社会隐患。所以, 在城市化规模和数量高速发展的今天, 必须开始思考城市化的质量问题。